

【中国文化原典重解丛书】

老子 我说

与南怀瑾商榷

中国文化原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且听董子竹的高见。
贾平凹隆重推荐！东方文化必须全面重估！

董子竹◎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原典重解丛书】

董子竹◎著

老子

我说

——
与南怀瑾商榷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我说/董子竹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354-2389-4

I. 老… II. 董… III. 老子—研究 IV. 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8267 号

策 划:韩 敏

责任编辑:何 海 曾 莉 陈俊帆 责任校对:刘惠玲

封面设计:灵动视线·老茂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嘉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8 插页:2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0 千字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人的困境与新世纪的新生命观

——再论迎接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到来

人类总是在自己与自己的命运搏斗中认识自我的。人类与自己的命运的搏斗，对于个体来讲，是终身的；对于人类整体来讲，是永远的。恐怕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与自己的命运的搏斗，就不会停止。那么，人类认识自我的过程，怕也不会终结。

翻开一部人类文明史，横看它，竖看它，不管是如何的令人眼花缭乱，透过人类奋斗的各种表象，吃、喝、穿、戴，言、笑、住、行，扩而广之，社会交往、文化艺术……乃至战争、政治……你会发现，凡是一种可以稳定地发扬光大的文明，可以构成统治一代几代、一地几地人心的文化，总是在企图回答这样两个根本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不管一种文明多么辉煌，多么久远，多么煊赫，当它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不出满意的答复时，这个文明最终必会灰飞烟灭，甚至踪迹无存。但是，任何一个辉煌、煊赫、久远的文明，基本都尽力在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的人类，对于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以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为根基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犹太文化。这种文化形态基本上是将答案推给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一切来自神、主、上帝……是上帝造了人，我们都是上帝、安拉的儿子。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不需要回答，不必回答，也不能回答，那是神、主、上帝才可以回答的问题。

第二类是以古希腊文明为根基的现代社会文明，即目前在世界上占据统治



地位的唯物主义文化。它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明确而简单的。人，是这个物质世界上的一部分，是一种碳水化合物化合物的构成，最多莫过是宇宙中的一种特殊物质，一个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物质体，一个不同于无机体的有机体的、生物性的物质体，有能动性的物质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对于自己的物质性存在的定义，恐怕会无限地延长它的“定语”……其“定语”系统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但是，对于这个文化来说，人，永远只能是“物质”。离了肉体没有人。

第三类即东方古文明，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则截然不同。它既不同意有一个神主宰的彼岸世界，也不同意人纯粹只是物质的人。这种特殊回答在古印度只是释迦牟尼这一派，在中国也只有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他们之后的所谓的东方文化对于这样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的回答，大半是游移于上面我们介绍的第一、第二两种之间。他们不敢明确承认彼岸神灵的主宰地位，便假言为“天”；他们不愿公开承认人只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于是便提出了所谓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诸多的模棱两可的东西。后期的东方文化，我们专指释迦、孔子、老子、庄子之后的东方文化，事实上是一种模棱两可、无所依托的文化。这种东方文化，既不甘心人像基督徒一样，干脆把自己交给上帝；又不甘心自己只是一个肉身物质体，如西方启蒙主义者那样把肉身人的需求当成“自由”的标志，彻底给予追求。“神”的道德与肉身人的需求混合相加，首鼠两端，时而左，时而右，是后期东方文化的主要特点，也是后期东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有些看似多一点文明的东方人，尤其是中国的“士”阶层人士，和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就只是多一点神的道德性。而那些东方文化圈中的“愚民”，即普通的老百姓，则看定人的肉身需求，盲目追求，其中有些人发展到不顾任何文明规则，游民意识十足。一旦他们的这种生物性盲目追求破灭，就多是转为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其实，就是那些作为东方文明人的“士”阶层，虽是满嘴神的道德，但终是压抑不了人的肉身需求，这便有了大量假道学、伪君子的出现。而那些把肉身生存需求放在第一位的东方“愚民”，也不甘心自己只是肉身人，人也毕竟不止是肉身需求，这便逼得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反而是回到了原始巫术神灵的怀抱。中国文化的这种尴尬，导致了中国社会心理的现代性失衡。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在近现代几乎成了一团乱麻，令一切仁人志士一筹莫展。

谁也找不到一剂包治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失衡性疾病的良药，虽然我们奋斗了二三百年来。如若人们不信，便请去阅读一下中国20世纪重要的三部文学作品《阿Q正传》、《废都》、《羊的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在中国，自孔子、释迦、老子、庄子之后，形成的这种文化体系，根本没有真



正理解东方文化三大原典作家的本意，反而是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天人凑合”的文化体系。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失衡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痼疾，除了与漫长的半封建半自治的村社自然经济文化有关之外，思想史上的这种混乱局面，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对此，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不垂头丧气，虽然我们也找不到一种根治这种文化心理严重失衡的痼疾的良药。我们以为，时下的中国人采取的“保守疗法”，本质上讲是合理的、谨慎的，怕也是惟一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中国人是为全人类的文化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与牺牲的。现在，中国、世界都在迎接一个崭新的文明，这个崭新的文明的火种正保存在中国。我们相信再过若干年，全人类都会感谢中国人历经千难万险，用千余年时间的屈辱、混乱、失衡，为人类新的文明保留了一丝可贵的火种。

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一定会以古老的“东方文化”为标的。

二

由于迄今为止，人类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缺少一种确定无疑的定论，人类对自己的考察与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资料整理的水平上。人类社会关于“人”的思考，时下基本上存在三种状态：

第一，根据对自身所生存的某种文化的研究，想从中找出一种改进、挽救、调整、弥补自己文化的方法。这个工作，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致力于此的学者是极多的。这大半是一种极富使命感、责任感的研究。但是，历史的进程说明这种研究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大半只能停留在学院的讲台上与教授们的书桌上。最近几十年，华人中的“新儒家”学说，基本就是这种命运。熊十力、冯友兰乃至牟宗三诸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比不了孙中山、毛泽东、胡适、鲁迅这样一些人物。不管教授们争论得多么热火朝天，民众对此几乎是毫无兴趣。

第二，根据对某个文化现象的研究建立起来关于人类的某种学说。比如西方的心理分析学派、人类文化学等等方面的学者如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布留尔、泰勒、汤恩比……在这方面还有一些思想家，他们不是学者，他们不依赖什么资料，大半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提出许多新颖的关于“人”的观念，如卢梭、尼采、萨特……这些学说、学派，在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轰动一时。但从终极上考察，这些人这些学说，大半也是过眼烟云，对人类的发展进程，尤其是人自己认识自己的进程，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的整体命运，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得到整体的改观。尤其应该看到的是，这些学者、思想家不管思维多么敏锐，他们的思维并没超越以往人类史上的学者与思想家，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他们并没有提出新鲜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所以，他们无法使自己的学说思想转化为一种新的文明。

第三种是精通于多种文化的学者所作的文化比较研究。这在现时代也是最时髦的一种研究，但从其目前的发展状态来讲，收效也不是很大。不管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多么翔实的资料，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无法回答人类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类到底是什么？进而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提出新的有建设意义的答案。也就是说，当这些研究家关心各种文化的差异时，忽略了对各种文化的共同特征的思考，从而也就无法回答这样两个必须给予准确答复的问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们以为对于“人学”来讲，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课题，虽然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它必然是人类在自己与自己的命运搏斗的过程中，逐渐破译的，即在历史的整体发展进步中，自会逐渐破译这两大难题。这当然不妨碍某些思想家在一定的时候提出自己新的理论。但如果人们在建立自己的“人学”理论时，忽略了对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的关照，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理论的建树的。最起码，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每当你开始思考“人学”问题时，首先应选对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方向。如果在方向上都是失误的，不管你的“体系”多么精微，说理多么雄辩，对人们心理的煽动力多么强劲，最终也只是把理论建立在沙滩上了。

三

根据我们的考察，以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为根基的基督文化、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并不像人们一般认识的那么浅薄。一般人的粗浅看法是，这个文化所主张的是，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类是因为偷吃了禁果之后，才带着原罪来到世间的。人对自己的思考，只能停留在《圣经》所说的这个水平，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再去进一步追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

人们只要粗略地对比一下《新约》与《旧约》，就会发现《新约》比《旧约》复杂得多，理论含量也高得多。从《旧约》看，这部作品明显与人类早期的多神崇拜有直接的关系。《旧约》文化是对多神崇拜的原始巫术文化的某种



程度的超越，但不是本质上的超越。伊斯兰教的教义学者最坚决地否定犹太教教义中所包含的多神教教义，进而反对基督文化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原因也在这里，虽然这三种文化都是从丰厚的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遗存中走出来的，但并不能使他们在今日成为一种统一的文化，关键是对上述两大课题，各自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从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关于上帝的提法里，对比《古兰经》中关于“安拉”的提法，我们倒是可以嗅到这两种文化对于“人”，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非常近似的答案。

伊斯兰教义的学者们坚决批评基督教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学说，可能是由于把基督教的这个提法，看得太实，不知这种话语表达内含的指代意义。其实，《古兰经》关于安拉的九十九种“美称”，如果细加探究，就有着基督教教义关于上帝三位一体的含义的内容。问题只是在逻辑归纳上的不同，实质意义上并没有太根本的矛盾。

仔细分辨基督文化、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异同不是本文的任务，本书的作者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只是认为，正如许多伊斯兰教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古兰经》经文中许多提法大半是拟人化象征性的理论表述。如果不局限于基督文化、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原典作品，即经文的文字符号的表层含义，而是透过表述符号，看它的实指，三家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回答未必有太大的差异。

我们相信，随着人类自己与自己的命运搏斗过程的深入，这几种文化对这两个根本问题，会作出近似的令人满意的回答。

但是，现今世界的现状却不是如此。自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这些冲突虽然就其实际内容说，还是一种利益的冲突，但如果没有人们对自己的文化见解的偏颇执着，冲突完全可以以比较缓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今日的世界里，因文化观念的偏见而产生的冲突愈演愈烈，很难说不会在某一日引发重大的世界性武力冲突。

从文化偏见出发，把本属于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不同文化见解的矛盾，演化成了理想矛盾，从理想矛盾进而成为文化冲突，文化的一般冲突又上升为政治的、武力的冲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大悲剧。准确地说，冲突的双方都是悲剧性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固执的文化偏见引起的冲突，已经可能给全人类的整体生存造成巨大的危机了。在冷战时代一直引而未发的核灾难及生化武器灾难，说不定会在现在的这场文化冲突中成为现实。记得英国有一位学者惊呼，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冲突骤然升温的时代，由于生化



武器的易于攫取，全世界数以百计的实验室中有一个被极端分子所利用，就有可能导致全人类的毁灭。

英国学者的这番言论实在是有几分耸人听闻。我们认为因生化武器引发人类毁灭，只是一种推理的可能性。这是由于这位学者是一位科学家，他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两个问题的，所以他会推论出，人类会因为生化武器的泛滥而毁灭。但是，对于许多企图攫取生化武器，企图用这种武器彻底埋葬自己的文化敌人的那些人来说，他们却认为他们只是毁灭一切异类的文化敌人，而自己是不会被毁灭的，因为他所崇拜的“神”、“主”会保佑他们，甚至会使他们活得更好。但是，对于任何一个跳到这场文化冲突之外的人来看，这实在是一场对双方都完全不值得的悲剧性牺牲。这样，在新世纪，跳出人们固有的文化信仰偏见，准确地实事求是地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在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融合各种文化冲突，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了。

对于最古老的东方文化来说，“信仰”本身也是一种虚幻的梦呓。它只是人类在自己的幼年期无法认识自我时，主观臆想的一种心理支撑。对于整个“宇宙——生命”系统，“信仰”本身了无实义。

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要实现这样一种文化进步，使人们看破“信仰”的虚幻性，决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于许多具有文化信仰偏见的人来说，即使有铁一样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也未必可以使他们在固有的文化信仰立场上移动半分。理论上的说服与教化，在文化信仰偏见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可是，如果从更深一层看，这场很可能会随时爆发的、以文化信仰偏见为前提的武力冲突，也许就是要迫使全人类及早猛醒，迫使人们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尽早作出大家都满意的回答的重要历史契机，迫使人类从固有的“生命观念”中跳出来，实现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四

我猜测，以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为底蕴的基督文化、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原典作家们，其用心是良苦的。以我们东方人的眼光看他们的原典作品，他们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是有自己的正确答案的。但是由于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刚从多神的原始巫术文化中走出的百姓，这些人不知人本主义的生命观为何物，旧的生命观即神本主义的生命观还严重束缚着这些人的思维。这些原典作家不得不借用神本文化的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对他们来讲，在那一时刻，理论上是否会产生误会并不

重要，能尽快把人类从多神的愚昧中解放出来恰是当务之急。在此时，他们不得不制造一种一神信仰来代替原始的多神信仰。也就是说人类必经一个一神尊崇时期，才能真正进入人本主义的“生命观”。

在这一点上，东方文化的佛学也有类似的情况。佛学是明确否定彼岸的神灵世界的。但是，你只要粗粗看一下佛经，释迦牟尼实在是给人们结构了一个庞大的佛国世界，光佛名、菩萨名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系统。释迦牟尼构造的这个佛、菩萨系统，既不能看成是多神文化中的多神崇拜，也不能光看成是象征性话语的理论系统。释迦牟尼实是结构了一个崭新的生命存在方式的系统，这个生命系统非神灵也非人间，但它是生命自身应有的创造能力的题中之义。虽然，佛学的这种既适用于当时的社会文化，也适用于未来的话语系统，十分巧妙，但是，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还是有明显的多神文化的遗迹。

我们不敢妄测以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为底蕴的基督文化、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创造之初是否也有与佛学同样的尴尬与深意。但是，从我们对这几种文化的原典著作的粗略考究，我们认为如今偏执地固守这几种文化信仰的人们，对自己的文化的实指及与这种文化的话语表述系统之间的差异的了解，是十分不够的。单一执着于话语表述系统的表面语言符号，非理智地将其神圣化、神秘化，未必不是时下人类的文化信仰偏见过分执着的重要原因。

人们太重视对话语表述系统的知见辨析，而没有重视把原典著作放在一定时代的生命观的演变形势中去分析，从而揭开原典著作的话语表述系统背后隐藏的对生命真实的描绘。

但是，我们也认为过早地让人们去体认到生命真实，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人类对生命真实的体认，应该有一个对自身生命的系统经验过程。对于一些缺少生命经验的人，过早地体认生命真实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我们这里所谓的生命经验，有个体与群体两种。一种是个人的生命经验的历史，一种是人类群体的生命经验的历史。第一种，就是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过程。我们所谓的人类群体的生命经验的历史，便是遵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

鉴于这种思考，我们更同情以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为底蕴的基督文化、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原典作家的良苦用心。当他们充分借用了多神的原始巫术神灵文化的话语系统，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真实的观点时，特别强调一神尊崇，更多是立足于“适用”这样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其实，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真有一个彼岸的神灵系统，但对于一般人又不得不用“神”这个概念。

对照东方文化，尤其是道、儒两家的原典作家的作品，如《道德经》、《论语》、《庄子》，这些作品的确是比较彻底地清除了神本生命观中多神的原



始神灵巫术文化的遗迹。孔子明确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老庄的著作中更不给彼岸神灵任何的地位。但是，他们对生命真实的深刻如实的描绘，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并不低于他们的正面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原典作家们一样，中国文化的原典著作没有对“神灵”作简单的否定，他们站在生命本来真实的立场上，肯定了“神灵”概念的某些合理性。但是他们没有如西方文化一样善巧地提出一神尊崇的教义，而是如实地提出“道”的概念。从理论上讲，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准确得多，但实际的社会效果，则反而是为东方社会留下了许多多神崇拜的残余。在当年，在东西方原典作家那里仅是表述上的差异，留给后代的社会影响却是截然相反了。

如果说老庄、孔孟把神灵从前门撵了出去的话，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就又把“神灵”从后门引回来了。纵观孔孟、老庄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多神崇拜的魔影没有一天彻底消除过，尤其是在民间有极广泛的势力。封建王朝的首领们自认为是“天之子”，大臣们自认为是星宿下凡辅佐人君，封建王朝的祭天、祭地、祭日月……民间的祭灶神、祭井神、祭雨神、祭河神……这一切直到今日，在中国社会也没有完全绝迹。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所有动乱的兴起，虽然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但引爆点大半是由于这种多神崇拜的残余在其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的军阀割据、民间帮会、社会动乱，无不是多神崇拜的变异。到了公元20世纪，气功还能一时风靡全国，实是多神崇拜的又一次死灰复燃。我们并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教义的拥护者，但是，我们认为，由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一神尊崇在西方世界有了广泛的影响，多神尊崇始终翻不起大浪。这就使得基督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内部，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对说来要有序得多，好管理得多。相比而言，自中国的封建君主垮台之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便进入了一个无序的、现代文化与多神崇拜愚昧文化相夹杂的失衡状态。军阀割据、帮会横行还是其表象，当然也是极端化的表象。若从社会的文化现象讲，今日的中国几乎是世界各色宗教、各色文化，包括今日的唯物主义、科学思潮的大博览会，这一切在中国呈现为一种无序并存的状态。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讲，虽然近五十多年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经明确确立，但原来的陈旧的社会文化关系，如由地域产生的乡亲关系，由家庭产生的亲属关系，因工作产生的部属关系，因上学产生的校友关系等等，都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起着极重要作用，都在无形地浸润着正常的有序的社会文化关系，使得国家的法律、规章诸多秩序很难正常维持。追根溯源，这种“关系”文化仍是多神文化的残迹在作怪。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五十多年，其理想的社会文化有序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这个责任不在共产党，而在于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化长期的无序化的滤淀。中国文化的这种无序化的滤淀，又



和中国文化的原典著作包容性太强，过早地使用非神的话语符号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举例来说，生命就其本来面目讲，任何存在，不管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都有存在的价值。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对于一段历史来讲，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就不是如此了。在某个相对的历史时期里，如果还要强调一切“无分别”，就会造成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无序混乱状态及严重的心理紊乱失衡。从目前的中国社会状况看，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紊乱症，虽是快要完结了，但其负面作用还是巨大的。

世界文化是一个运动变化的整体。对此，若缺少宏观的整体的观照，就可能以偏概全，从而形成某种文化信仰偏见。一旦陷入某种文化信仰偏见，将永难以回答那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今日的世界文化，凡有序的，文化信仰偏见过于顽固，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势所难免，更说不上公正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凡相对无序的社会文化，倒是不致和别的文化产生生死斗的斗争，但自己的内部又难以进入一个相对的文化心理稳定状态，也无暇去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真是两难。

文化，灿烂的人类文化，你是人类的骄傲，但也是人类的一切遗憾与悲剧的根源。文化，你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只有当你真正跳出文化的局限，既不迷信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也不诋毁他人和对手的文化，当你真正有了三分超越感，你才会有能力、有兴趣回答：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文化是生命之“果”，任何文化体系都无法直接用自己的话语系统直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但脱离了文化你也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五

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是人本主义生命观的直接产物，是人本主义生命观的直接成果。正如前文我们所说的那样，在人本主义的生命观完全确立之前，人类文明分了一个岔，一个是西方的一神尊崇的文化时代，一个是中国具有封建意义的民本主义的文化时代。如果你认真研究过东方古文化，不管是孔子，还是老子，及他们的继承人孟子、庄子，基本上是提倡“民本主义”的文化观念。这种“民本主义”文化观念，表面上看来与西方一神尊崇的文化观念是对立的，但从现有的东西方原典作家的作品看，其来路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对多神的原始巫术文明作了彻底的扬弃，都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有一定程度的体认。如果可以假设，假设对东西方文化的原典作家都同样提出这两个问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估计都会作出极其近似的回答，起码在大方向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但是，由于个人理解上的原因，以及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原因，东西方文化的原典作家在基于对生命本来面目的一致看法的前提下，却建立了两类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如果说传承的话，近现代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上述两种文化的直接转承，如果不是东西方原典作家对多神巫术的神本生命观的彻底扫荡与清除，唯物主义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势力。但若从血缘上讲，这种世界观的本源还应是从古希腊文化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以人的生物性为根本特征、惟一特征来看人的。

“我是谁？”“我便是我的肉身。”“我从哪里来？”“我从大自然来。”古希腊文化对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的回答，直接导致了人本主义生命观的建立，也导致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以古希腊文化为前导的，14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以三维空间为基石的经典物理学直接支持了这种生命观。经历了数百年的社会进步，这种生命观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命观。

在人本主义的生命观统治人类社会的漫长日子里，虽然世间经常发生许多奇异现象，如佛教、基督教中出现了许多舍利、不朽的肉身现象，也有些关于某些人怎样忆起前世的报道见诸报端，但是作为有着决定作用的人类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问题的回答，人们仍是坚信古希腊人的观念；不管人们是否自觉，不管人们对现有的生命观是否有怀疑。然而，真正动摇这种生命观的，恰恰是这个生命观文化的派生物——当代自然科学。

首先造成这种“生命观”动摇的，是经典物理学的被突破。人，作为一个从大自然而来的生物人，其赖以存在的东西，首先是外界时空框架的稳定性，但相对论动摇了这种时空框架的稳定性。这便使得人类引为自豪的，以知识的积累为前提所构成的人类智慧大厦动摇了。时空都是相对的，你在这个时空中获得的知识能是绝对的真理吗？如果人类的整个智慧大厦都是摇摇欲坠的，随之而来的推论便是，人的肉身生物性存在是不是也应是一种虚幻的错觉呢？此时的人类如果善于思考，怕是要对古希腊人关于“人”的回答产生疑虑了。那人类又该如何认识自己呢？我到底又该是谁？随之而来的是量子力学对人类智慧大厦的进一步挑战，如测不准原理、质能互换原理的出现，都在动摇着人对自我生物性存在的确信。然而，这一切科学的进步，虽然把古希腊人的生命观念摇了三摇，撞了三撞，但是人类如此这般的生命观并没有真正倒塌。这是因为我们这现实的人间世界还在，人类依人本主义的生命观建起的全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还仍然完整无缺地在人类社会起着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



人类人本主义生命观基石的松动，但只要这种生命观构建的现代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得不到挑战，人们是不会去理会这些变化的。

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人的另一种变化，却是被许多人所觉察了，这便是财富对人的“异化”。这个时代的人类，虽然还不能正确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但是已经意识到古希腊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古希腊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使得财富对人的异化成了合逻辑的推理。与这个合逻辑的推理相并存的，却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世界现实。以财富为基础的，阶级对阶级的压迫，民族对民族的压迫产生了。人成了人的敌人。如果古希腊的回答是正确的，难道人类社会这样悲惨的现实便是天定如此吗？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的多次大战，均是对地球财富的争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大张其帜，正是针对了这种世界的不公平。科学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把解决这个矛盾的希望寄托在阶级对阶级的、民族对民族的斗争胜利上，而是寄托在物质的极大丰富上。人的有限的肉体需要一旦得以普遍满足，世界的这种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这样，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便成了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

当社会进入后现代，人们突然发现，物质的极大丰富，科技的快速发展，也照样威胁人类的生存。环保问题越来越突出，人类的科技进步不但可能污染整个地球，甚至还可能污染宇宙。生物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被现代科技无情地破坏着。人们突然发现人的最大敌人不光是“他人”，更重要更突出更可怕的恰是“自己”。随着环保问题的突出，核威慑、生化武器的威慑也提到了人类的议事日程上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核技术、生物技术再也不可能只是某几个国家的专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随便一个实验室，就可掌握毁灭地球毁灭人类的手段。人类在享受高科技的利益之时，也对高科技造成的危害防不胜防。

与这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机器与传媒都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使得所有的人都必须受到它们的绝对钳制。启蒙主义时代的英雄们幻想的，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幻影。人类几乎不敢仔细审视自己的生活，只是在稍微冷静一点时，才会发现自己早已把自己驯养在了一个貌似温馨的牢笼里。然而更可怕的，在这个温馨的牢笼里，人类随时都有彻底毁灭的可能。人类，太可怕了！

这毕竟是人类的一些精英才会觉察到的，更多的被驯化了的人，在这个巨大无边的牢笼里，仍然是自得其乐。但是，进入20世纪末期，另外两大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恐怕会使在牢笼里自得其乐的被驯化了的人类，也无法自安其位了。



这便是信息工程与基因工程。信息工程现在给人类带来的主要是快捷与方便,即便信息工程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文化翻天覆地的变化,估计这变化也是渐进的。迄今为止的人类各种文化,说到底都是地域性的。一切文化差异都和地缘有极密切的关系,国家、民族、宗教……乃至家族、家庭等等,说到底都是依地缘的局限性建立起来的文化模式。但是,随着因特网的出现,预示着地缘观念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会迅速缩小。一旦“因特网”像电、水一样成了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无孔不入之时,情况又会怎么样?迄今为止,人类依地缘框架建立的各种文化框架的命运又会如何?国家、民族、宗教……乃至家族、家庭之类的文化概念,最少其本身会产生质的变化。如果说信息工程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是渐进的缓慢的,不可能产生爆炸性的效果,也就不太可能引起巨大的灾变的话,那么基因工程的发展就未必了。现在在全世界各国政府不都在明令禁止对人的克隆吗?看来人类已经意识到了基因工程可能产生的可怕的负面作用了。基因工程最后要动摇的怕不止是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伦理道德文化。基因工程可能在一定的时代绕开人类固有的道德伦理防线,但它不可能因此而放慢自己的脚步。人们没有意识到基因工程真正要突破的防线,不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些防线,而可能是人类关于“生”与“死”的基本观念。

估计一旦基因工程实现了全线的社会性的突破,古希腊人的答案在人类心目中,想不彻底动摇也不行了。起码古希腊人对“我是谁?”的回答,可能发生根本性的疑惑与动摇。如果基因工程实现了对人体一切器官皆可更新的研究与操作,那么请问“死”这个概念又该如何理解呢?当一个人的肉身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换代之后,他仍然“活”着、“生”着,“死”又到哪里去了呢?古希腊人对“我是谁?”的回答,即我只是这个“肉身人”的答案能是令人满意的吗?更可怕的不是理论上的不完美性,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混乱。如果基因工程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医院就可以把他的干细胞与基因图谱全部储存起来,一旦这个人出了什么意外,如车祸、灾难、战死之类,人类完全可以申请医院依他原有的干细胞与基因图谱再克隆一个“他”。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新的一个“他”,该如何对待自己原来的父母妻子儿女呢?这个“他”与亲属朋友之间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更有趣的是,这一技术一旦成为广泛的现实,那人类防止各种灾难的规章、制度、法律及有关的单位、企业还有必要存在吗?如保险企业、慈善机构、公安机关之类,到那时,今日专以毁灭、限制人的肉身为惩罚前提的法律、战争,还有意义吗?

更重要的是,到了那时候,“死亡”于人也许不过是一种游戏,那么人们对于自己关于“生命”的观念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生活”的观念又该是



什么样子呢？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认为这时就可以直接产生新的生命观。当人们面对基因科学的神奇作用时，已经不能确定回答“我是谁？”的提问了，但不见得会立即得到另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基因科学不管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准确回答“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提醒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在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偏见终身奋斗的人们，面对生死观都泯灭的状况，你的信仰，你的文化又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样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人们必须求教于东方文化的原典著作。对于这两个问题，东方文化的原典作品，尤其是佛学与道学，都有详尽而明确的答案。但是理解东方文化三位原典作家的作品，必须翦除“身见”、“我见”、“边见”。这对现实社会的人们来讲，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我们也不会奢求今天的及未来的人类都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东方文化三大原典作家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寄希望于人类自己的社会实践，我们相信人类在与自己命运、自己的困境左冲右突的搏斗中，自会逐渐接近真理，以致最终体认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证明，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上的揠苗助长，百害而无一利。照理说东方文化中残存的一些巫术现象，的确可以帮助人们对生命本来面目的理解，但提倡这些东西的负面作用，不会亚于环境污染、核灾难之类的社会现象。只有让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在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自己去明白自己，自己去体认自己，才是最稳妥的方法。

人类从神本生命观转化到人本生命观大致用了一万年的时间，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所谓历史，就是这两种生命观的转换史，你看他有多么艰难复杂？生命观的演进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但一种生命观肯定要代替另一种生命观。假设现今的人类将要进入一种崭新的生命观，这个过程也不会是很轻松的，但新生命观是任何人也拦不住的。

六

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人类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课题时，中国人是最操之过急的。这种过急所造成的负面作用是被中国人两千年，尤其是最近一千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正如一个孩子，过早地告诉他，你这一辈子一定可以成为世界巨人，这是一件绝无好处的事。这种说法无异于一剂毒药，甚至可能最后毁灭这个孩子。

孔子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以为孔子在这里暗喻的，恐怕不只是某一个体应有



的认识自我的成长史，而是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的应有过程。

任何一个真理，若忽略了人对真理的体认过程，往往会造成更加巨大的灾难。

如果我们急迫希望人类早一日正确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不仅要寄希望于人类社会本身实践的历史，更巴望人类的平均寿命能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孔子所说的“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理状态，也许是人类可以回答我们上述两大问题，并可以得出最佳答案的年龄段的心理状态。可惜今天的人类一到了这个年龄段便已是垂垂老矣，再也没有年轻人那种青春的活力了，更不会有如年轻人那样希望打开人类一切奥秘的雄心。这便大大妨碍了人类对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体认。即便有个别过了七十岁的人，可以体认到一些生命本来面目的迹象，但也很难取得社会的共鸣，进而成为一种社会性共识，这些人的观念对人类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也就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如果假设人类的年龄普遍都可以达到一百五十岁、二百五十岁，那就是说，进入了七十岁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理状态后，每个人还有一半的人生历程。在未来的七十多年八十年的青春焕发的时日里，人们对人的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体验就会大不一样了。因此，我们把人类真正体认自己本来面目的希望，寄托给社会历史与人类的长寿上。

我们这个希望是建立在对东方文化三位原典作家的作品的理解之上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对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体验之上的。我们认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如果不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东方文化三位原典作家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深刻回答的。

自东方文化三位原典作家完成了他们应有的使命之后，他们的学说的正确传承大半没有过第三代。孟子和孔子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孟子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思路，完成了对民本主义政治哲学的构建，但在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关键问题时，就远不如孔子透辟。至于儒学到了董仲舒、孔颖达、韩愈及宋代的周、张、二程、朱熹诸人手中，大半是在使东方文化不断社会化、实践化的过程中，也不由自主地庸俗化了。例如“内圣外王”的提法，不管如何说都只是一个“民本主义”政治哲学的提法，决非孔子思想最精华的东西。起码是与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思想有相当的距离。所谓“内圣”，就是《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内圣”必是“明明德”者。这不仅是对“王”的要求，也是孔子希望通过扩大教育的手段令一切人都可以达到“内圣”，这便是孔子“有教无类”的主旨，说雍也可以“南面”的真实含义。在孔子心目中的“内圣”，决不是王者及其臣下可以垄断